

杨松轩 诞辰一百廿周年 纪念文集

杨育坤 赵玲琪 孟广涵

主编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杨松轩诞辰120周年 纪念文集

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004号

杨松轩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9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3插页 208千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

ISBN 7—5419—2453—9/G·2138

定价：平装：6.50元 精装：10.00元

前 言

杨松轩先生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教育家，是一位值得后人崇敬和纪念的先驱人物。

他生于忧患的年代，青年时期接受刘古愚先生的教育和影响，与华县志同道合的顾熠山、郑云章诸先生先后组织了“友仁学会”、“集义书社”和“教育研究会”等团体，一直致力于教育改革事业，致力于移风易俗、革除积弊的工作。早在1902年（光绪二十八年），就在家乡龙潭堡创建义学，这是他改革教育的初步尝试；1907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，借大王庙办起华州教育研究会附设两等小学堂；这一时期，他还组织了“天足振兴会”，设立女子学校。先生的努力，得到社会的重视，民元受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次长之职，继又被选为省议员，副议长。但因看不惯当时的官场生活，毅然返乡全力以赴从事地方教育事业。1919年4月8日正式创办了华县私立咸林中学。杨松轩等先进人士所从事的事业，都是具有创新性质的，顺乎时代潮流，合乎社会需要。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称颂杨松轩是“时代之前驱”，这是十分妥贴的评价。

杨松轩先生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创建新学的活动，不只是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，而且具有挽救国家危亡，转变社会风气的意义。他把国家的强弱、民族的盛衰，紧紧地与教育能否发展联系在一起。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、贡献非凡、深受景仰的教育家，除旧布新的思想家。他的思想和教育实践，给后人

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，需要我们去挖掘、整理、研究。他开创的事业和进取精神值得后辈弘扬光大；他那坚毅果决、矢志不渝的高贵品德，值得学习；他的优良传统，更应继承和发扬。

先生功在教育，功在人民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为了搞好人民的教育事业，杨松轩教育思想研究会、华县教育局、咸林中学共同发起，于1991年8月22日至23日在先生亲手创办的华县咸林中学，举行了纪念杨松轩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，与会同志达百人以上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济济一堂，盛况空前。大家怀着一片赤诚崇敬的心，踊跃撰写纪念文章。为了缅怀先贤，决定汇集同志们的研究成果，出版纪念文集。本文集共收入纪念文章数十篇，其中部分文章为已发表过的。编辑过程中，在文字上进行了一些加工和删改，但限于水平和时间，难免有不妥之处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这本文集的出版，得到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，任新房先生的热情赞助在此深表谢意。

目 录

不朽的事业 可贵的品德

- 纪念杨松轩先生诞辰120周年……………杨育坤 (1)
- 杨松轩的教育思想与实践……………张安民 (13)
- “教育发展之国靡不智且强”
- 为纪念杨松轩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…宋伯胤 (29)
- 顺乎时潮、尽瘁教育的杨松轩先生……………张建祥 (42)
- 现代教育的先驱者杨松轩……………郑涵慧 (48)
- 我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——杨松轩……王永惠 刘亦农 (57)
- 陕西早期的教育改革家——杨松轩……康多寿 甘成哲 (74)
- 杨松轩教育思想初探……………王永惠 刘亦农 (81)
- 继承和发扬杨松轩先生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……张 锋 (97)
- 杨松轩教育思想鼓舞我们继续前进……………李瑞礼 (101)
- 简论杨松轩先生与辛亥革命……………张应超 (105)
- 杨松轩先生改革教育为民主革命服务……………甘一飞 (120)
- 纪念爱国教育家杨松轩先生诞辰120周年……………刘玉堂 (123)
- 爱国主义教育家杨松轩先生……………杜松寿 袁定中 (126)
- 以教育事业终其身的著名教育家杨松轩

……………孟广涵 张应超 (138)

鞠躬尽瘁创办新学 呕心沥血培育桃李

- 纪念杨松轩先生诞辰120周年……………贾治中 (142)
- 纪念母校——重温在咸林中学的生活……………杜松寿 (149)
- 继承和弘扬杨松轩精神

——纪念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家杨松轩诞辰120周年

-孙渭川 (168)
- 杨松轩先生扶贫教育思想的探讨.....杨念瑞 (182)
- 勤俭办学 为国育才.....史鸿宾 杨兆进 (186)
- 满江红.....范秦武 (188)
- 歌赞母校咸林中学创始人杨松轩先生.....冯进学 (189)
- 杨松轩在中国现代教育中的历史地位
-孟广涵 刘亦农 (193)
- 杨松轩的家庭教育.....刘亦农 (202)
- 学生壁报花絮.....高北平 牛治川 (219)
- 咸林校风浅议.....李应仓 (223)

附 录

纪念杨松轩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

-张应超 (226)
- 一位工读生的贺信.....王 睿 (231)
- 参加杨松轩先生12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记.....孟广提 (233)
- 先父松轩公的政治生涯.....杨芝芬 (235)
- 请于公右任书写“德厚教深”纪念碑经过回忆
-关中哲 (277)

风檐展书读 古道照颜色

——“杨松轩教育思想研究会”筹建概况

-赵玲琪 (278)
- 杨松轩教育思想研究会章程..... (281)
- 杨松轩教育思想研究会组织机构及两届干部名单..... (284)

不朽的事业 可贵的品德

——纪念杨松轩先生诞辰120周年

杨育坤

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家杨松轩先生，华县龙潭堡人，1872年（同治十一年）生，1928年（民十七年）辞世。他一生殚心教育事业，执著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，创办了华县私立咸林中学，积极从事革新社会的活动，不仅造福桑梓，有益陕东，而且影响全国。他的事业和精神，永远值得纪念，应该加以深入地研究并发扬光大。

创办新学，教育救国

杨松轩出生于忧患的年代，那时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，内受腐败的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。一些先进的思想家、革命家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事业，组织、领导人民进行武装反抗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斗争风暴，尽管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。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，革命不彻底，中国人民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，祖国大地处处是愚昧与落后，偏僻闭塞的西北尤甚。青年时代的杨松轩，没有为科场上获得的“功名”所陶醉，于1896年，游学味经书院，深受主张维新变法的

刘光蕡先生（号古愚）的教育和熏陶，与友人顾燏山、刘经轩等人组织友仁学社、集义书社，研究传播新思想；到1906年（光绪三十二年）成立教育研究会，着手筹办新学。1907年（光绪三十三年）创立两等小学堂。此后几经曲折，终于在1919年（民国八年）4月8日，成立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校。

杨松轩先生所以不遗余力地置身于新学的创建活动，是因为他亲身体察到民族的危亡与教育落后密不可分。他说：“现在国力不竞，外交失败，实国民无健全分子使然。国民无健全分子者，国民教育未普及故也。”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战胜法国（指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）、日本挫败俄国（指1904年日俄之战），都是小学教育之功，所谓“识者谓兵战之结果，即学战之见端也。”（1915年《教高第四次毕业训词》）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新学的创建，旨在“裨益国家，转移社会，非聚多数青年，灌输普通知识，树他日应用基础，鲜克有济也。”只有普及教育，才能挽救危亡，才能转变风气。如果仅仅为了“学生博取虚名”，岂不与科举无异。因此，他在《教育研究会征求意见函》里明确提出：“国无学不能自立，人无学不能自存”，并且认为“地方文野，全视教育振兴与否”。显然，松轩先生把国家的强弱、民族的盛衰与教育事业能否发展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说明先生和他的同仁们所以立志创办新学之目的全在于此。

就在杨松轩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仁急谋创建新学的当儿，旧的科举和传统的私塾依然同时并存，而且在许多地方还拥有巨大的势力，它们压抑着刚刚从大地上萌芽的新生事物——学校。松轩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光，果敢的勇气和毅力，向科举和私塾发起进击，决心要建立一所具有特色的崭新学校。

首先，他坚决摒弃科举和私塾，一心一意发展新学。科举取士和传统的私塾，在松轩先生的心目中，不过是“博得……虚名以炫耀”，“与身何益”、“与国何裨”的“利禄之教育”（1909年《致庆弟》）而已！他在1901年《辛丑和约》签订后不久，致书好友雨亭说：“值此事变，我辈读书犹沾沾利是图，岂不可耻可笑？！”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已不愿应试。他说：“今岁本值正科，人皆欲展骥足，弟实甘效螻居”。并认为清廷“又下恩科之诏”（指溥仪即位，下恩科之诏，赐先生‘恩贡’），也是“多此一举”！与培养封建卫道士的科举或私塾不同的新学，无论就其宗旨和所学科目看，都完全是另一个面目。因此，新学一经出现，就遭到代表顽固保守势力的豪绅和私塾的反对。为了发展新学，必须与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。先生公然提出，对那些“不明学校真谛，不谙教授方法”“扰乱乡人耳目，达反对学校之目的”的私塾，应“严加取缔”。甚至在1918年（民国七年）拟定提案交付省议会讨论，以此谋求新学的大发展。

其次，松轩先生创建的教高（教育会附设高小之简称）和随后成立的咸林中学，都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，学习氛围活跃，民主空气浓厚，绝非旧式私塾所能比拟。早在1902年（光绪二十八年），松轩先生在《潭峪堡义学章程（并序）》中就指出：“学能变化气质，虽愚可至于明，虽柔可至于强。”主张“讲解最宜为先”，“体操尤不可缓”。这和“读死书”、“死读书”的私塾大相径庭。以后他提倡学生“放眼世界，发达国家思想”，（1915年《教高四次毕业训词》），每个人应尽国家一分子的义务；而且认为“将来国民程度提高，在今日学生；将来国家地位巩固，亦在今日学生。”（

1919年《咸中七周年纪念感言》）明确表示，国家的主人翁就是学生，学生应该关心国家大事。先生的呼声，唤醒和启发了学生强烈的爱国心、责任感。不仅如此，先生还从京、津等地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，有才有识的知识分子来咸中执教，著名的有魏野畴、王复生、王懋廷等人，其中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，他们在校工作认真，教学负责，深受学生欢迎，而且传播革命思想，一时学校出现了各种进步社团和学术组织。松轩先生因势利导，亲自起草学生自治组织章程，名为“《咸中市》”，学生都是咸中市的公民，藉以锻炼其自治能力。校内讲演会、体育会、青年会、新剧团、青年励志社、马列主义研究会等都相继诞生。松轩先生本着“苟无逾越范围情事，学校概不干涉，使学生能发展个性”。并且还主张教师担任“指导之责”，一扫“旧日印板式教育之弊窠”。（《咸中小识》）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，先生十分重视学生品德的培养。他利用课内外各种机会向学生讲授做人的道理。在一次朝会上，以“财产不足贵，最贵是人格”为题，教育学生树立高尚的品德，他对当时“黑幕重重”的官府和军阀统治，嫉恶如仇，不断告诫学生“不要受军阀、政客、官僚利用，亦不利用军阀、政客、官僚，自贬其价值。”他在《咸中第四学级毕业训词》中说：“此后无论升学与否，作任何事业，毋坠品格，毋荒学业，毋长内乱，毋屈外力。”特别要求他们自爱自处，绝不可和“万恶军阀，无耻政客，娼式官僚一炉而冶。”他十分反对作为主人翁的学生，毕业后“籍口生活问题，甘心受军阀，官僚支配自己”，“以人之进退为进退，以人之荣辱为荣辱”。（《咸中第一级毕业训词》）从这些语重心长的讲话中，不难看出，先生人格的伟大，教育思想的可贵。

由于松轩先生反对残害人民的旧势力，积极提倡和支持进步势力，此后在咸中形成了强烈的民主潮流，学生思想普遍活跃。这一传统继续有所发展，到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尽管反动派多方阻挠、打击进步势力，但师生中抗日救亡的要求；反内战、争民主的声浪一直十分高涨，并且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各种进步组织，成为中共地下党在陕东的基地之一。

再其次，松轩先生创建的教高、咸林，十分重视课堂学习与课外实践的结合。即教育与生产结合、与社会结合。那时，学校附设有农场、园艺部、理发室、豆食公司、食堂（咸林春）、银行、合作社、粉笔厂、医院和公储局等（《咸校生活》1933、5、13）。就园艺部而言，其中有面粉、蔬菜、农业栽培、蚕桑业和畜牧等项。这些部门的设置，为学生提供了实验的园地，创造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好形式，为学生走向社会打下初步基础，此其一；其二，这些生产或服务性的门类，既满足或部分满足学校生活的需要，又增加和扩大了学校的财政收入，解决或部分解决经济拮据的咸中经费；其三，学校园艺的栽培，使校园内绿树成荫，果菜飘香，繁花似锦，风景宜人，形成优美的学习环境。所以杨松轩先生在《教高九周年感言》中把这些生产或服务部门视为“欲立不拔之基”的一项特别的设施。因此咸林和一般中学相比，显然有很大的区别，部分不理解的师生难免有不同看法。当时杨明轩同志给就读于咸中的儿子复信时写道：“中国旧式教育，尽养成了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废人，懒惰的游民。该校劳动化的教育，适足以矫此弊。”又说：上课、工作“两者互相调剂，脑筋与筋肉更迭休息，有百利而无一弊”。他对咸中开展生产劳动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，也是很有说服力的。

咸中不同于其他中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工读生。松轩先生开办学校不久，就发现一些家境贫寒的子女上学困难，遂决定采用半工半读的工读生制，允许一部分穷人的孩子免费或半费入学。这一方式，既为无钱的孩子创造了求学的机会，又给经济不富裕的学校提供了不必支付工资的服务人员。这是一举两利的事。一般说来，工读学生，学习刻苦，思想进步，以后不少人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。

在松轩先生的教育思想陶冶下，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离开了母校，他们多数学习成绩优良，勤劳质朴，爱憎分明，有的考入高一级的学校就读，有的进入社会，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。他们成就有大有小，但大都能记取先生的教诲，做一个正正直直，诚诚恳恳的人。校友们交谈起来，很多仍念念不忘咸中的美好过去，回味昔日的传统美德，往往以此而自豪。充分说明咸中教育是比较成功的。

革除积弊，发展实业

杨松轩先生全力以赴的创建新学的同时，并致力于革除千百年来流行在广大农村的恶风陋俗。正是这种不良的积弊，妨碍社会的进步，国家的发展。

1906年（光绪三十二年）他在《教育研究会章程》中曾提出“有碍进化诸积弊”都要“随时妥议救正”办法；并印发了早在庚子年（1900年）撰写的《女学发轫》一文。此后又在致三弟鹤庆的信中表示“余至州学，改良一切，扫除历年陋风”的誓愿。不久，又在拟定的《秦省讲演总会章程》中，把“廓清恶习惯，输入新知识”作为讲演宗旨之一。类似的主张不

少，说明松轩先生对革除落后的陈规陋习之决心是多么坚决。在革除积弊中，以提倡妇女放足影响最大。封建时代的妇女，长期处于受压抑受奴役的地位，缠足积习，无论对肉体和精神都是最大的摧残。但妇女自身并不理解它的危害，反而以苦为乐，以丑为美，世代相习，难以更改。松轩先生与好友组织“天足振学会”，大声疾呼，号召妇女放足。为此特意编写了生动通俗的《放足歌》，在集市或街头进行宣传。歌中写道：

阿婆们，多信佛，观音菩萨是大脚。

快放脚，莫裹脚，媳妇好孝二公婆。

放了脚，不软弱，百病不生血气活。

自拿柴，自烧锅，行动麻利人快活。

替女婿，做些活，不论男女一家乐。

这首歌曲在当时自然起了促进妇女放脚的作用。不只如此，松轩先生和朋友们共同制定“有子不娶缠足妇，有女不许缠足而读书”的规约，先生对自己或至亲的女孩子都不打折扣的照此办理；而且家中所有缠足妇女，规定在同一天放脚，谁也不能例外。这一做法，为华县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，也为三秦和西北大开风气之先。

改变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倡女子上学，华县私立模范女子小学（即少华女校的前身）就在这时应运而生。先生率先送自己的女儿就读。过去一向宣扬的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和重男轻女的观念，受到挑战。由于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积习和政局的变化，女校在成长过程中，是颇费周折的。先生虽未担任女校具体职责，但从不置身局外，从筹划、创建到财务措置，一直参与。先生逝世后，女校校长陈乙初先生在悼词中

哀叹地说：“呜呼！自今而后，女校之艰难，女校之状况，再对谁诉？女校之进行，女校之发展，后和谁商？”（引自《父丧记·谏词十六》）华县所以能够首建女校，实出于先生之努力，是显而易见的。

破除旧俗的又一个侧面是男婚女嫁。封建礼教下的中国，婚姻是根据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来认定他（她）们终身的。这种包办买卖婚姻，深受习惯势力的保护。而先生在处理家庭儿女的婚事上，完全突破了“门当户对”的传统，抛弃包办买卖婚姻的旧习，嫁女娶媳，都就商于当事人，并且只论才识，不计家资，这在当时如无大识大勇是做不到的。

上述三个方面，是对腐朽落后观念的有力冲击。是移风易俗的重大行动，有助于启迪民智，树立新风，意义十分深远。其他类似的事实不一而足，毋庸一一列举。

在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中，更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中国经济，增强国家实力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松轩先生和其他先进人物一样，也极力宣传发展实业，科技兴邦的主张。

在松轩先生看来，兴办实业的关键是培养人才。1909年（宣统元年）9月，他在《致庆弟》的信中写道：“闻胡平有由东回陕，拟改宏道学堂（原为宏道书院）为工业学堂”，接着兴致勃勃地称赞道：“此举实属要务”。说明他对培养实业人才的重视。辛亥革命不久，先生在拟定的《秦省讲演总会草章》中，明确提出“普及教育、兴办实业”的口号。随后又有华县贫儿工读互助学校及实业补习学校的设立。在他为这两所学校制定的简章中，强调养成善良国民必先授与儿童所急需之知识技能，即规定一面学应用知识，一面补习普通文化课程，采取科技与文化并重的原则。在贫儿工读补习学校中男办竹器工

场、印刷场；女办纺织工场，缝纫工场。实习补习学校设农业、商业等门类。总之，他主张办各种不同类型、不同层次的职业学校，为发展地方实业准备人才。先生如此重视实业，重视实业人才的培养，是因为他把实业看做是“国家社会之急需”的缘故。他在临去世的前夕，写给四弟鹤瑞的信中谈了自己的看法，认为“目前革命人才，第一当预备者，端在建设能力。建设能力，非求之高深学问不为功”。可见他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一批有才干的建设人才啊！

对于兴办实业，先生没有停留在口头上，他先后在咸中建立的农场、园艺部、合作社、医院、公储局等，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。此外，他还联络同志，采取入股集资办法，创建利济源会社（即书局，简称“利济社”），主要经营中小学课本。同时准备搞纺纱，再及织染等生产部门（1922年《利济工厂简章》）但以集资有限，改营茧桑。再从先生和友人亲属的来往信函中，曾多处提到托人购置轧花机、抽水机、纺纱机、织袜机之类以及引进良种的事。先生不仅用以发展生产，更主要的是为了提倡科学技术，这些都说明他对发展实业是尽了努力的。当然，限于条件和资金，实业范围和规模究竟有限。尽管如此，发展实业，科技兴邦的主张是有可取之处的，也是有意义的。

刚正果决，矢志不屈

杨松轩先生一贯刚正廉洁，不务虚名美誉，终生效力于自己理想的事业。他以坚毅果决，矢志不屈的精神和各种反对势力进行斗争。这就是他所以能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要原因。

先生处在一个王朝末日和军阀争权夺利的年代。那时，社会正经历一个伟大的剧变。当他青年时期，康、梁维新一度代表进步思潮，先生受其师刘古愚的影响，积极支持维新。随后变法失败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勃起，这时，康、梁竟坠落为“保皇党”，而先生却一往无前，赞同和支持革命；以后在反袁、反复辟和反军阀的斗争中一直立场鲜明。他热心社会事业，对政治的黑暗，社会风气的败坏，深表不满。从不为名利所惑。不为利禄所诱，一心扑在事业上。1910年（宣统二年），他赴省期间，亲身目睹官场的腐败，在给庆弟的信里这样写道：“余居省数十日，往来各局，所见所谓种种廉政，无非涂饰门面，毫无实际，费生民之血膏，供官绅之挥霍”而已！民国成立，先生以办学名著于世，受任省军政府教育次长之职，仅一月有余，就以“省政庞杂”，自觉“秉性与官府不宜”为由，辞职旋里。次年，又被选为省议会议员，1917年举为副议长，留居省垣数月，再次亲身体察到省上各机关内部“互相攻击，纯是意气用事”，又看到机关中“每月觅事之人，或函荐或亲谒，不下数十起”（民二年六月于西安信）的不正之风，毅然回归家乡，决意不入政界。此后先生一直忌与官场往来，对当时腐败的官衙看不惯，瞧不起。在一次朝会《训话录要》里，记载了一条“依靠鬼神与依靠政府”的讲话标题，究竟真义何在？虽不能尽知，据题意看来，大约是指鬼神不存在，靠不住，不可信。当时的官府同鬼神一样，也是不可依赖的。所以先生在县主持校事期间，一般是“非公延不入衙署”。（《关秀卿怀念先生文章》）由此可见先生的为人了。

先生回县后，一心一意从事地方公益事业，一时“教育会事。附设小学事，代办中学事，公储局交涉事，利济社改组